

吴文化史从

王友三
主编



王友三 主编

吴文化史丛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吴文化史丛(上)
编 著 者 王友三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楠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20 插页5
印 数 1—1000册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199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160—3/K·138
定 价 15.5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篇 绪论	1
第二篇 吴地先秦考古学	39
第一章 吴地区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	40
第二章 吴地发达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	47
第三章 吴地青铜文化	70
第三篇 吴语	110
第一章 吴语的古今	110
第二章 吴语的地理分布	122
第三章 吴语内部的异同	128
第四章 苏州话的语音系统	137
第五章 苏南吴语的词汇与吴语文学	147
第四篇 吴地经学与史学	160
第一章 清以前的吴地经学和史学	160
第二章 清代的经学	174
第三章 清代的史学	197
第五篇 吴文学	218
第一章 萌发期——文学的融合与撞击	218
第二章 自觉期——理的转移与情的升华	226
第三章 衍化期——由俗到雅的历史走向	243
第四章 总结期——群星灿烂与流派纷呈	260

第六篇 吴美学·····	280
第一章 吴地美学思潮(上)·····	281
第二章 吴地美学思潮(下)·····	300
第三章 古典美学的终结·····	316
第七篇 吴地戏曲艺术·····	322
第一章 戏曲的形成与宋元时期吴地的戏曲活动·····	323
第二章 明代前期的吴地戏曲·····	329
第三章 明代中叶的吴地戏曲·····	334
第四章 明末清初的吴地戏曲·····	361
第五章 清代中叶以后的吴地戏曲·····	385
第八篇 吴地文献渊薮·····	398
第一章 抄本时期吴地文献渊薮·····	399
第二章 刊本前期吴地文献渊薮·····	413
第三章 刊本后期吴地文献渊薮·····	439
第九篇 吴地书院·····	461
第一章 吴地书院的缘起与演变·····	465
第二章 吴地书院制度的形成·····	473
第三章 吴地书院制度的终结·····	501
第十篇 吴地宗教·····	510
第一章 吴地佛教·····	512
第二章 吴地基督教·····	551
第三章 吴地伊斯兰教·····	572
第四章 吴地道教·····	591
附记·····	638

第一篇

绪 论

正是由于有了人,宇宙的时空坐标中才出现了文化。文化无非就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对自然及人本身的认识和把握。人,既是文化的体现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物质和精神的新世界,即文明的世界。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于世界存在的现状,而始终前进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自然和人本身的历史之中。

宇宙的时空与体现时空的物质就其本质来说,是无始无终和广袤无垠的,因此,人们对于旨在认识和把握这种客观无限性的“文化”,也就必然会有难以穷尽的概念界定。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文化却都有着这样的共识:即文化归根到底是受历史发展制约的社会现象,这种人类生存、发展的一般活动方式,反映着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和过程。由此共识出发,当代的人们对文化所展开的多方位、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考,其中特别是对于区域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于人类文化、民族文化的内涵与价值的理解。

一 吴文化的一般界说

中华民族的文化,无论是在历史上或是在当今世界,都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若干单元的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之中交相映照而构成的一个系统,吴文化,与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越文化等,都是包容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之中的,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区域文化。

然而,在一较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基本上侧重于考古学的领域。人们或是以对某一文化遗址发现时的现代地理概念来命名和研究该区域的文化;或是仅仅把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地望作为界定某一区域文化的依据。这样一来,似乎就割断了初民文化与以后文化发展变化的联系,而这一状况可以说是受西方文化学对于人类古文化的研究定式的影响而形成的。人们通常所说的吴文化,一般是指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5 世纪,即西周王朝至春秋时期的吴国文化,以及现代人在这一历史区划中的考古学发现。

上述狭义的吴文化概念,在以往的有关区域文化的研究中,既为人们分析吴国文化的特有风格提供了明确的空间规定,也有助于人们从吴国历史区划的考古学发现中概括出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古文化特征。然而,随着区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吴文化的价值,决不仅仅在于让生活在现代的人们知道,在那遥远的历史岁月中,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是怎样生存和生产,怎样认识和交往,而在于揭示出这一胚胎文化如何在其生长的过程中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世世代代的人们产生了持久的影

响,在于让今人知道它如何以自己的特有品质与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奉献出巨大的能量。换言之,人们从吴国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发现了狭义的吴文化概念所难以容纳的、却又同它有着一脉相承血缘关系的绚丽夺目的文化内容和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吴文化的概念就必须突破原有的、狭义的时空规定,而重新赋予新的广义的时空规定。本书所论述的吴文化便是具有新的时空规定的广义的吴文化。因此,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书在以后的论述中使用的吴文化概念,除了另有限定之外,都是指广义的吴文化。

由于对包容于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若干区域文化的地理定位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少分歧,其中对狭义的吴文化的地望界定也是一个争论热烈的话题,因此,广义的吴文化的区域确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吴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当然地包括了狭义的吴文化的内容,但是,狭义的吴文化的区域与广义的吴文化的区域既叠合又不全然重合。

从历史上的吴国的疆界来看,吴国的疆界与吴文化的区域的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然而,自“太伯奔吴”至吴国为越国所灭,这段长达五百余年之久的岁月中,吴国疆界变化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由于时代的久远和可信史料的匮乏,今人要想非常准确地勘分出当年吴国的疆界是极为困难的。但不管怎样,从考古学所提供的具有吴文化鲜明特征的材料中,以及从可以依据的文献记载中,我们还是能勾勒出它大致的轮廓范围。作为在春秋初期曾称霸一时的吴国,它的疆域版图曾经北至淮河,南抵江西,东达杭、嘉、湖,西及皖南。

应当指出,这片幅员颇为辽阔的疆域,既不能作为当时吴国文化,也不能成为吴文化的区域规定。这是因为,吴国称霸诸侯的历史毕竟非常短暂,在它尚未将其扩张的领域中的其他文化同化于自己的范式时,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故而,不仅在当年吴国领

土扩张所抵达的地方的文化风貌与吴国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在吴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所表现出的鲜明个性，更是某些地区所未曾秉赋的。因而，春秋时期吴国鼎盛时的版图并不能作为吴文化区域规定的依据。

从吴文化与其他相邻的区域文化的关系来看，有些区域界线非常清晰明瞭，而有的却很难确定。位于吴文化区域北部的鲁文化和西部的楚文化，尽管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着甚为密切的交往互融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区域界线的界定，无论是从考古学的发现，或是西周春秋时期的诸侯割据的史料记载，还是以后各区域文化自身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都很清晰地提供了划定各自文化区域的依据，而这些区划界线又为人们所普遍认同。

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就是吴文化与越文化之间的区域界线划定了。我们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吴文化与越文化的渊源非常接近，即它们几乎共同秉赋了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基因。除了历史文献中的“吴、越同族”、吴、越先民皆“断发文身”的记载，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也表明，吴、越地区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域之一。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宁（波）绍（兴）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的三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序列。其中，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湖熟文化为吴文化的主源，而宁（波）绍（兴）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为越文化的主源，当是不存在疑问的；然而，吴、越文化在各自承继其文化主源的同时，又都不约而同地秉赋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遗风，这就造成了区划吴、越文化疆界的困难。第二，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在争霸的战事中，都有着吞并对方的辉煌记录。可以想像，无论是开始时的吴国战胜越国从而迫使勾践卧薪尝胆，还是后来的越国灭亡吴国从而使夫差挥剑自刎，都在无形之中促就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交融。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区划吴、越文化地望的困难。第三，

除上述客观的历史原因之外,目前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争夺名人出生地、扩大对先民文化地域的认同等主观人为因素,给吴、越文化的区划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如有学者根据《国语·越语下》中的一句话,范蠡“击鼓兴师”,“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便断称姑苏应为越地^①。对于这一判断至少有两点疑问:其一,姑苏成为吴都乃是吴王阖闾迁都的结果,翻遍所有史料未曾发现任何记载阖闾迁都有战事的文字。倘若姑苏原是越国城池,阖闾此举非入侵莫属,在那诸侯之间动辄兵刃相见的年代,吴国占越国城池建都能不爆发一场昏天黑地的战争吗?故而,阖闾迁都姑苏无战事,唯一合理的理解就是姑苏乃吴国自家庭院。其二,所谓“不伤越民”,其意是说范蠡灭吴为推腐拉朽,没有劳伤越民,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从政治版图上勾掉了吴国;而并不是说其占领姑苏时,注意保护当地的越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吴文化孕育、成型、生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以及从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有关吴文化区域的共识中,客观公正地勘分出吴文化的区域界线。吴文化的区域是由以太湖流域为腹心,东至上海,西到宁镇,南达杭、嘉、湖的宁沪杭三角带,与北延扬州的小片江北地望所构成。在这一区域文化圈内,苏州、无锡两地从吴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处于理所当然的核心位置。

地域界线的勘分,为我们探索吴文化的源头标出了明确的空间范围。当然,有关吴文化发源地却是一个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宁镇一带的湖熟文化乃是吴文化的发源地。“湖熟文化,其前期即我们所认为的先吴文化,后期即我们所认为的吴

^① 参见董楚本《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应当承认,《吴越文化新探》一书中很多见解都颇有新意,且给人以启示。但在吴、越文化地望上的判定,则是本书所不能苟同的。

文化,吴文化最初发源于宁镇地区。”^①

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吴文化的源头。“商代至西周早期,宁镇、太湖、赣鄱三个地区的地方性特征比较明显,而从文化面貌上看,太湖地区的遗存和以后的吴文化更为接近,因此太湖地区应是吴文化的发祥地。”^②

将上面两种观点相调合的有:“在旧石器时代,太湖三山岛上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代宁镇地区出现了北阴阳营文化和湖熟文化,这些常被人称为先吴文化。”^③

还有学者根据江西素有“吴头楚尾”的说法,以及在江西境内的某些考古学发现,认为吴文化的发祥地应是江西,而不是太湖流域^④。

我们说,对某一区域文化发祥地的判定,其视野不应凝滞于某一文化遗址,也不能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而应重点考虑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能反映这一区域文化基本特征的原始文化的地理位置;其二是这一区域文化在形成其结构系统时所吸收融合的主要原始文化源头的地理位置。这即意味着,在把握区域文化主源的同时,并不排斥多元化融合的可能。因为,任何形态的文化若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首先就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成熟期的文化是这样,形成期的文化也是如此。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说,吴文化是由宁镇地区和太湖流域范围内的若干原始文化汇合而成的,其主源应为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和湖熟文化;而太湖流

① 萧梦龙《初论吴文化》,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② 纪仲优《浅谈吴文化和先吴文化》,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4辑,1982年。

③ 许鑫、顾建光《吴文化与海派文化散论》,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

④ 《社会科学报》1991年10月10日。

域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序列,以及宁(波)绍(兴)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也是吴文化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来源。此外,中原文化、楚文化等都对吴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由于它们的影响并未达到决定吴文化基本格调的程度,故而也就不能被视为吴文化的源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乃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最高表现,文化发展的程度,也就是衡量人与自然相分离的程度。由于人的劳动——一种全然有别于动物本能的活动——使劳动的对象(自然界)演化为文化;由于文化的陶冶——一种超越于自然的人化自然情境的感染——使劳动的主体(人类)发现了人的真正本质。这种人与文化互为因果的关系,从人猿揖别的那一刻起就已存在。当我们根据这一原理去考辨吴文化的源头时,不仅可以评估出吴文化区域中最早的先民创造出的文化的成就高度,而且还可以发现吴文化的源头如何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端倪。

从已发现的位于吴文化区域中数十处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人们可以看出:

以稻作文化为主体和特色的农业文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考古学的材料显示,吴文化区域中的北阴阳营、湖熟、马家浜、崧泽、良渚,以及吴县的草鞋山、常州的圩墩等文化遗址,都有大量的水稻种植的遗迹;再加上上述地点出土的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遗迹,表明作为吴文化源头之一的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农业文明,不仅醒目地显示出该区域文化的个性特征,而且也表现出在新石器时代它已领先于以粟文化为主的中原半坡文化和仰韶文化。

以丝织为代表的织物文化表现出吴文化在发端期所达到的惊人的手工业文明高度。在太湖流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丝织品,经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是“以家蚕丝为原料织成”的、“中国最早的(比中原约早 2000 年左右)丝织品”,因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此外,5000 年以前吴文化区域中的麻纺织品已是以纬线起花的罗纹

编织。从技术上讲,大大超过了同时期中原仰韶文化的平纹编织;从文化上讲,则显示了吴先民的创造性智慧和审美意识。

以精工雕琢的玉器为代表的玉文化,既反映了吴先民在生活情趣上的特有品位(同时期其他区域文化基本上是以石饰为主),而且反映出吴文化在其源头时期社会分工已达到相当细密的程度。考古学发现,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就有了加工精细的玉璜、玉环,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则出现了刻有兽纹、鸟纹,甚至多层次浮雕的玉器精品。

以印纹陶及经过轮制具有独特造型的陶器为代表的陶文化,不仅为以后在吴文化区域中形成有自己风格的陶文化开启了良好的端绪,它还对中原、楚地的陶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吴文化的起源时代,瓷器的始祖釉陶也已出现。

此外,具有清浊声母之别的吴语,使吴文化的源头更加富有个性。据专家分析,吴语作为吴文化区域中所特有的汉语方言之一,除了清浊声母有别而外,还带有短促的入声,其声调多达七八种(一般为四种),并且吴语的特点一直留存到今天。

总之,由曾生活在吴文化区域的先民所创造出来的上述文化成就,既是吴文化得以发祥的特有端绪,同时也是吴文化及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文化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流长。就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而论,吴文化的上限追溯到距今大约一万年,吴先民在太湖三山岛上留下的文化活动踪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的吴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作为它的下限。在万年之久的漫长岁月里,作为中华民族的区域文化之一,吴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贡献出无数的精华;在这同时,它自身也发育得十分成熟,显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不仅如此,吴文化还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不仅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且将自己的光彩辐射到了海外,为人类文化之树增添上一片常青叶。

从历史的角度观照,便可发现吴文化发展的起伏变化的阶段性,而这些阶段性是通过其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现的不同风貌来确定的。吴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一万年后至公元前 11 世纪,即远古时代的吴文化孕育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以我们在分析吴文化起源时例举的太湖三山文化为代表。

第二阶段,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即西周春秋时代)的吴文化萌芽期。在这一阶段上,吴文化犹如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芽,除了从其种子承继下来的文化基因之外,它还大量地吸收了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西面的巫楚文化,以及东南地望的越文化的滋养。由于吴国处在群雄争霸的氛围之中,它无论是主动地八方出征,或是被动地遭受四而来攻,都为文化的碰撞交融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一些与孕育期不同的风貌特征。主要有:以铸剑制戈为代表的冶炼技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而尚武的风气使得一些异域人才——如孙武、伍子胥——在吴国创造出丰富的军事思想;以邗沟、胥河为代表的运河及水利工程,创下了中国人工开拓水道的纪录,既刺激了稻作文化更高水准的发展,又促使了吴文化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的交流;在手工业相当发达的基础上,表现出与中原地区仅限于农业耕作的经济结构的差异,虽然这只是一个并不完备的多元经济结构,但却孕含着极其深远的文化意义。

第三阶段,约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即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吴文化发育生长期。吴文化并未随吴国的灭亡而退出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它以极为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虽历经战国血腥动乱、秦汉专制一统以及魏晋南北朝风云变幻,但在地灵人杰的滋润下,竟而透露出发育生长的旺盛活力。这一历史时期吴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风貌是:在弘扬个性品格的前提下,以宽容的气度对来自各方的文化精萃广容博蓄,其中包括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

吸收；以其超群的魅力，将自己的文化成就贡献给华夏大地，并通过吴地将包括吴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传播到海外；经济上的丰饶和政治、社会的相对安宁，使吴人的智慧及审美情趣得到了充分展开，从而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阶段，约公元5世纪至公元15世纪，即隋、唐、宋、元及明初的吴文化发展高峰期。又是一千余年的岁月沧桑，吴文化达到了它的发展高峰。在这一阶段，经济上，吴地已呈稳执中国牛耳之势；文化上，吴地绽现百花争艳风景这边独好之貌；人才上，江南才子独领天下风骚。尤其是与湖泊溪水相辉映的怡然自得、同杨柳青竹相契合的纤柔灵秀、与商贾工艺相匹配的精明智巧之人格范式的形成，更显出吴文化的特有魅力。由于明中叶之后，吴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故而吴文化出现了转型的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将隋、唐、宋、元及明初时期的吴文化判定为它的发展高峰。

第五阶段，约公元15世纪至19世纪末，即明中叶以降、清代及近代的吴文化成熟转换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式微，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接踵于坚船利炮进入了东方古国。由于吴地成为西学东渐的首当其冲的滩头阵地，故而这一历史阶段吴文化呈现出的突出风貌是：以海派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格局的转型。曾经以拥有东方灿烂文化成就而自豪、自尊的吴人，在经历了挨打的痛楚和落伍的忧患之后，率先接受了相当程度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在认同西方文明上领先于其他区域文化，是因为自明中叶之后吴地（主要是苏、锡、常）萌生了资本主义的幼芽；二是在认同的过程中并不乏顽强的抵抗，这是与封建专制闭关锁国及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密切相关的。但不管怎样，相比较于其他区域文化，吴文化毕竟领先一步，开始了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

二 吴文化的氛围及同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

当人类的祖先直立起身体揭开人类文化历史剧的帷幕时,那人猿揖别的舞台背景便是天工造化的自然环境。随着文明的不断进化,天工造化的自然环境背景中逐渐增添上人工造化的色彩。但直到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乃至文明更加升华的未来,人类还是始终要在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背景下去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这即是说,广袤无垠的大自然与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永远处在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系统之中。

我们说,历史和文化总是在时空坐标上的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获得发展的。这是因为,首先,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无论是刚刚学会钻木取火的原始人,或是已经坐在航天飞机机舱里的现代人,其生存和发展都同样要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其次,人类只有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劳动中,才能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即创造出文化。离开了客观的自然,人类也就失去了劳动的对象,创造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了;最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与生俱来的既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原始人不可能想像在已具有人工造化色彩的自然环境中活动;同样的道理,现代人也不可能再真正拥有一个纯粹天工造化的自然环境。既然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及文化有着如此水乳交融的联系,故而我们在讨论吴文化时便不能忽略或漠视对吴文化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分析。当然,这种分析并不是纯粹理论上的描述,而应将自然环境同吴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联系起来予以考察。

中国古人曾有言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人心易。”（《管子·水地篇》）又云：“橘逾淮而北为枳，鸛鹑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考工记》）很显然，古人的这些看法带有相当程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误，但却也为后人在探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原因，以及把握某一区域文化为什么具有这些而不是那些特色提供出值得注意的启示。

与中国的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吴文化区域无疑拥有着无法企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优势。首先，就土地资源及气候状况而言，中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地”的说法，因而某一区域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数量及质量，对于中国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文化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吴地位于长江下游，它由肥沃的太湖流域平原和坡度平缓的宁镇丘陵地带所构成，加上温带的气候、充沛的雨量，使这片土地获得了可以一年三熟的条件。“苏湖熟、天下足”，不仅是对吴地的溢美之词，也是对它的客观评价。其次，从交通及水利状况来看，吴文化区域有着敞开的东海大门，贴身而过的长江走廊，贯连中原和吴地的运河，“包孕吴越”的浩淼太湖，以及境内四通八达的河网。三江五湖培育出了与水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吴文化。据专家考证，“吴”字是从以水为生的“鱼”字演化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吴”字的形状宛如“鱼”。就连姑苏之“苏”字，金文也写作为活灵活现的鱼形。完美的水网之利，使吴文化成为中国诸区域文化中最开放的文化系统之一。复次，吴地虽然不是某一矿产资源的富有蕴藏地，但它却拥有着“百宝盆”般的自然物产资源。除了鱼米之乡这一农业文明的基础而外，“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使吴地商业文明的发展有了天赐良机；而茂盛的竹林、绵延的桑田、丰厚的陶土等等，又为吴地手工业文明的早熟和发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在那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多层次文明的创造过程中，吴人的智慧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并进而形成了吴人引以